

新學人

穷变通久

——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常金仓 / 著

新学人文库

XINXUERENWENKU



辽宁人民出版社

新学人文库

穷变通久

——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 常金仓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常金仓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6

(新学人文库)

ISBN 7-205-04145-7

I. 穷… II. 常… III. 文化史学-研究-中国 N. K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7396 号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41 千字 印张:10 $\frac{1}{2}$ 插页:2

印数:1—6,000 册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 杨

责任校对:李景祥

封面设计:刘冰宇

版式设计:王珏菲

定价:17.00 元

《新学人文库》学术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元化	叶秀山
江 平	李学勤
金景芳	徐中玉

策划 刘 杨

《新学人文库》出版缀语

伴随着我们时代的最强音——改革开放，中国学术文化迎来了它的春天。以此为背景和契机，中国新一代学人的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我们确信，新一代学人将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学术界的领风骚、执牛耳者，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作品和大师级人物有可能从其中孕育。目前正是这批人年富力强、成果迭出的时期。我们有意为新一代学人的成长、成熟留下一份思想的记录。

《新学人文库》倡导富于思想性与文化意蕴的学术和立足于学术基础的思想文化创作。学术是思想的资源、文化的精华；思想、文化是学术影响现实的中介。无论这种表述是否准确，我们都想借以表达这样一种思想与追求：一种思想或文化形式之所以能对现实有较强的影响力，乃是因为它植根于学术的深厚土壤中；一种学术之所以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也是因为它以特定的方式、在更深的层次上牵连着现实的社会生活。

当我们这样说时，并不是要排除那些足够专业化的学术成果。实际上我们深信：没有也不可能有与现实无关的纯粹抽象，不现实的东西不会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问题只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素质和“眼力”去领受晦涩中蕴藏的深刻、“读出”抽象背后的现实。学术不仅与“现实”相关，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一种现实。专业化的学术标志着人类智识在某一方面所达到的极致状态，它是“大众文化”向系统化的发展和向真理

性的迈进，二者非但不矛盾，还相互依赖、彼此促进。

毋庸置疑，商品经济的大潮正使人们变得异常“现实”。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赤裸裸地呈现。宁静的书斋生活和学院气息似乎越来越远离时代的中心而变成一个古远的梦境。这当然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我们会愈发强烈地感受到文化、学术、知识与现实生活的深刻联系。经济生活不能没有理性与理想的“观照”，现实不能只是充满喧哗与骚动，还必须有“意义”和“价值感”；同时文化与学术亦当感应时代的脉搏，拿出具有时代水平的扎实厚重之作。因此，我们将《新学人文库》的作者和读者都定位在较高的层次上。就作者方面说，我们希望通过《文库》推出新一代学人的成名作、代表作，在贡献于学术事业的同时，使之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理解，在更广的范围内产生影响、发挥作用；就读者方面说，我们希望《新学人文库》的出版，有助于他们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同时使“更多的人”即便不能进入专业化的学术生活，也能通过“学术”，多一种关注现实、理解现实，抑或是参与现实的方式与途径，并从中受益。

我们愿通过切实的努力，为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乃至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我们期望《新学人文库》成为世纪之交中华学界之精英、精华与精品的荟萃，并在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史上留下些许跨世纪的足印。

编者谨识

1998年1月21日

目 录

绪 论	1
一、危机还是转机	1
二、政治史学的原理	14
三、历史学的科学冲动	25
四、文化史学是一种研究策略	36
五、发现真理的两种方法	49
六、历史规律问题	61
七、文化的整体观与人为分割	71
 第一章 中国本土文化的类型	78
一、中国文化在史前的抉择	82
1. 四种社会组织力和三种文明	82
2. 宗教热情的低落	85
3. 在礼法德刑之间的权衡	98
二、手势语言与原始礼仪	108
1. 方法问题	108
2. 原始礼仪的起源	112
三、礼仪质文之变	129

1. 手势语言的仪式化	130
2. 风俗习惯的简化	132
四、礼乐文明的若干特征	138
1. 现实主义者	138
2. 重视教化	140
3. 名实与义利	142
4. 木讷的人格	144
5. 中庸之道	145
6. 象形文字	146
第二章 国家与文化	148
一、两个步骤、独特形式	149
1. 多种多样的部落酋长	150
2. 施舍聚民	153
3. 以家代国	163
二、自然不平等与等级制度	165
1. 年龄	167
2. 血统	170
3. 才能	172
三、典范政治	178
1. 什么叫典范政治	178
2. 强化典范政治的两个因素	184
3. 典范政治的蜕化	188
四、君德与君臣关系	190
1. 节俭	190
2. 勤劳	192
3. 养民	194
4. 含垢忍辱	196
五、国家产生方式制约下的诸制度	201

1. 脰膳之礼	201
2. 委积之礼	203
3. 饮食之礼	205
4. 政治与血缘	207
5. 婚姻与政治	209
六、国家产生方式制约下的政治观念	213
1. 民本思想	213
2. 隆一而治	217
3. 暴力革命	219
七、夷夏之辨与以德怀远	220
1. 无知与偏见——民族政策的一个侧面	222
2. 博大的襟怀——民族政策的另一侧面	232
第三章 东周的社会变迁	235
一、社会控制与社会变迁	237
1. 失范	237
2. 僭越	239
3. 怠慢	243
4. 贬损	246
5. 变故	248
6. 因俗	249
7. 礼文繁缛与礼文不具	251
8. 行礼背义	252
9. 礼坏乐崩下的知识界	253
二、人口、生态与社会变迁	257
1. 人口奇缺的种种现象	258
2. 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人口局部过剩	265
3. 回应人口压力的挑战	273

第四章 社会变迁中的政治和经济思想	282
一、从礼治主义到法治主义	282
1. 法治思想产生的原因	285
2. 以“术”济“法”论	295
3. 法治运动中的反传统思潮	300
二、从操纵分配到组织生产	305
1. 分配思想的由来	305
2. 重农抑商和农商并重	313
3. 国家职能转变以后的价值观	321
后记	325

绪 论

一、危机还是转机

从本世纪 80 年代开始,由于社会发展重心的转移,中国史学——这个在人文社会科学大家族中享有累世尊严的学科,遇上了令人极其难堪的考验。这种考验是前所未有的,而且看样子还得维持相当长时间才有希望摆脱困境,所以,有些思想敏感的学者很快就发出了“史学危机”的惊呼。然而,“危机”这个字眼伤害了历史学家,尤其是富有成就感的历史学家的自尊心,他们认为这一说法未免危言耸听,从而拒绝承认史学会发生什么危机。无论“危机”一词用在此处是否恰当,一些现象还是客观存在的,如年轻一代总是把他们的理想前途和那些比较实用的学科联系在一起,史学对他们失去了先前的诱惑力。这一代人新的价值取向直接导致了高等院校历史专业生源不足,迫使一些院校的历史专业通过改行适应新的形势,谋求新的生机;高校和研究所里的史学从业者缺乏必要的研究经费,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些正在走红专业工作的同事在国拨科研费用中切去一大块而自叹弗如。为了在争夺经费战中获胜,各院校在改革名义下制定了类似联产承包那样的政策条款,教授被看成单位的摇钱树;历史学家在成果公布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困难,那些仅供同行对话而不具有起码数量读者的著作不得不积压在箱篋

之中,而一些颇有学养的学者也要经常去编撰一些通俗读物去迎合读者,而严肃的学术著作的出版,则要艰难得多。这只是大体而言,具体情况还要丰富得多。历史学家经常宣称他们的研究有帮助人们预见未来之效,但是像医不自治一样,他们却从未见微知著,预见到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也算一个小小的讽刺。

1. 潜伏在史学内部的危机

“危机”是伴随着社会改革出现的,因此对多数人来说不假思索就把它看成是改革的后果,那些与历史学同时陷入困境的学科似乎也可以成为上述看法的旁证。但是,仔细想来,历史学的所谓危机已经潜伏很久了,这应该从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学科性质以及后来的知识分化得到解释。历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清人章学诚说“史为记事之书”,^①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或者说他只是从史学的外在形式立说的,实际上历史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政治学说,载事系年不过是阐明那种学说而采取的特殊形式或特殊手段罢了。春秋战国间的学者相信中国史学的萌芽形态是结绳记事,《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同篇又说包牺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那么在他们心目中,史学是产生于尚未创造文字的包牺氏时代的。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经得起检验,它告诉我们史学是为了满足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一开始就与“治”道联系在一起。历史学的这种性质也可以从它的从业者身上看出来,古代历史学从业人员不像今天的历史学家一样是企图从历史中获得对人类自身认识的纯粹

^① 《文史通义·书教下》。

的学者,而是统治集团的一分子。《周礼》三百六十官都有数量不等的“史”,《宰夫》八职,史居第六,职务是“掌官书以赞治”,他们由上而下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官僚系统,搜集政府各部门的档案簿书,积累起来就是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那时,历史还不是一种学问,完全是一种实用。史官的政治地位至汉代没有变化,《汉仪注》说汉武帝设太史公一职,“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史官所以有威严,历史学所以有威严,还因为史官是国家行为的监督者,上自天子、诸侯,下至卿士大夫,他们既可以使你盛德久传,也可以使你恶名远播,春秋时晋国史官董狐、齐国的太史氏就是人所共知将执政大臣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物,而“史书工诵”则是使人君永无逸德的制度保证。孟子有一句名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①这就是说史官书事记言、乐工诵诗传箴,在西周时代都具有纠正君主过失的功能,春秋以后,王道政治一去不返,诵诗隐喻的方法已无力承担起先前的重任,所以诗作变成毫无意义的事情而与王者之政一起销声匿迹了,惟有史官还具有抑恶扬善、端正道德人伦的作用,所以孔子才发愤修《春秋》,以期惩恶劝善,弘敷王道。孔子一生“论次《诗》、《书》,修起《礼》、《乐》”,^②都是整理前人旧籍,只有《春秋》是他的新作,作《春秋》之前,采用什么形式表达他的政见,他有过明确的说明,他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③所谓“空言”就是用概念术语进行说教,所谓“行事”就是历史事实,他认为前者远不如后者更能深入人心,这种抉择并不是孔子的天才

① 《孟子·离娄下》。

② 《史记·儒林列传》。

③ 《史记·孔子世家》。

创造,正是史家传统的手法。在后世史学家的眼里,《春秋》无非是一部记述往事的流水账,因而王安石斥之“断烂朝报”,但《春秋》用1.6万余字记242年的历史,可见作者的出发点不在于述事。中国图书自有四部分类以来,《春秋》一直被列于经部,也说明古人并不把它看成是一部史书。《庄子·天下》说“《春秋》以道名分”;《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果是一部载事之书,怎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政治作用?由此可知,在孔子以前,史学就是政治学,史学家本人也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家。

但是在孔子以后,经学和史学开始出现裂痕,史学的功能也显示出分化的征兆。人所共知,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和《穀梁传》是经传,而《左传》则是史传,前者以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即政治伦理为己任,后者却竭力铺陈史事,希望能为《春秋》大义提供历史的背景。对于历史学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暗示着史学原先肩负的政治使命将由经学取而代之,它自己可能退居到次要的地位上去。西汉从武帝时开始了一个以经学治国的时代,擅长于政治说教的《公羊》学成为一门炙手可热的学问,而晚出的《左传》却受到《公羊》学家殊死的抵制。这并不是因为《公羊》学家担心《左传》取消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独尊地位,也因为史学在辅政方面比不上经学来得更加直接。西汉后期,当刘歆提议立《左传》于学官之时,今文经博士反对的理由就是“左氏不传《春秋》”,^① 否认它是经学而以史学视之。当孔子既著《春秋》并授学于七十子之徒,“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不可以书见”,只好“口授其传指”,^② 终于导致“仲尼没而微言

① 《汉书·刘歆传》。

②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①《春秋》用历史形式阐说政治学说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东汉时古文经著作先后列于学官给学术界带入了一种与先秦和西汉迥然不同的学风，古文经学，包括《左传》学，一味致力于文字的训诂和制度的考证，殊少政治的、思辨的色彩，这样的学风不仅完全违背了孔子著《春秋》的宗旨，而且使史学的内容和形式——政治学与历史学——的裂痕越拉越大，左氏学将一步步沦为书生的事业而与政治越来越不相干，难怪历史学家总是推《左传》为中国编年史的不祧之祖而不数《春秋》。

在我所读过的经学史著作中，《春秋》三传的关系都被看成陈年往事而作漫不经心的叙述，没有一本从中觉察到历史学终将有失宠于政治的危险，大概是因为这一次史学与政治的分裂并不彻底，《左传》在被历史学家奉为编年史之祖的同时还始终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因为它毕竟包含着辅翼《春秋》的价值；自司马迁以后，经、史虽然各立门户，但史学由于与《春秋》的渊源关系也一直没有丧失资政卫道的功能。司马迁著《史记》自称要“继《春秋》，述往思来，影响当世”^②；袁宏《后汉纪序》认为“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他决意“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宏敷王道”；李延寿《上南北史表》也说“斯盖哲王经国，通贤垂范，惩诫之方，率由斯义”^③。章学诚把中国古代历史著作分为二类，他认为那些具有现实意义而理论上自成体系的著作应叫作“撰述”，是史学的上乘，而那些仅仅客观记述旧制往事的作品应叫作“记注”，等而下之。他一力主张“史所以经世，

① 《汉书·艺文志》。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 《北史序传》。

固非空言著述也”。^① 这些言论表明，修史为当时政治服务是著述家与理论家达成的共识。事实上自司马迁“继《春秋》”著《史记》后，重新使史学经学化从而使经史合流的倾向还时有发生，例如五代时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社会动荡，纲常伦理一蹶不振很像孔子生活的春秋季世，恢复名教是北宋政治上的迫切任务，欧阳修著《新五代史》便亦步亦趋地效法《春秋》，尤重于褒贬善恶，他自谓“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启”，^② 《宋史·欧阳修传》也说他“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他过分高涨的政治热情竟至妨害了《新五代史》作为历史著作的起码规范——历史的真实性，于是引起两个学者猛烈的责难。^③ 中国古代史学的性质培养了历史学家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精神，他们认为历史学只有从属于政治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经世致用应该是历史学的最高宗旨。经世致用之“用”在不求甚解的读书人那里往往被泛化为有无社会效用之“用”，实际上它的意义范围很小，仅仅指是否有益于政治。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旧史学曾为其长期服务的封建时代相比，在很多方面给人以恍如隔世之感，旧史学在新的政治制度下本来已经丧失了解释力，国家的行为应该让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去加以说明。但是历史学与政治悠久的合作使历史学家离开政治不知该如何独立工作，因此双方不仅没有解除盟约，而且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又建立了新的关系，从

① 《文史通义·书教下》；《内篇二·浙东学术》。

② 《欧阳文忠公全集·附录卷一〈事迹〉》。

③ 吴缜《五代史纂误》；杨陆荣《五代史志疑》。

1949年开始,历史研究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口号又支配了以后30年的历史学。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史学做了些什么,最近出版的一部回顾和评述近50年中国史学思潮的著作做了比较详尽的回答。^① 尽管我十分理解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历史学家能做些什么,但是也不能不说那时候的历史学几乎完全沦为“现代经学”了,不了解当时政治状况的人,是很难真正读懂这类著作的“微言大义”的。从表面看来,历史学家在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农民战争的作用问题、历史的创造者问题、社会史的分期问题,等等,实际上这些问题的讨论都是围绕当时政治的特定使命而展开的,几家权威性刊物被看作是这些使命的风雨旗,只有善于对那些信号心领神会的人,才算抓住了历史的重大课题。政治的兴奋点在不停地改变,历史研究的主题也随之不停地变换。

在这里我们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一一指出“现代经学”热点问题的政治内涵,关于政治史学的工作原理将在下面一节作总体剖析,然而人们兴味盎然持续了30年之久的古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也许是“现代经学”的一个典型案例。中国历代旧史写到那些与本朝缔造者一道推翻前王朝的农民起义时除司马迁为陈涉列了《世家》,其余几乎都被贬为“盗贼”,目的是防止今后再发生那样的犯上作乱从而危及本朝的统治,只有新中国的史学热情地歌颂了他们的丰功伟绩,毛泽东同志有个著名论断,他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② 他采取这样的立场目的在于说明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政权不同于历

①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1991年版。